

## 精微朗畅, 壮采遒骨: 陆机散文论<sup>〔\*〕</sup>

○ 刘运好, 黄东坚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按照《文心雕龙·总术》“文笔”的分类标准, 陆机文可分为无韵之笔和有韵之文两类。其无韵之笔, 亦即散文, 又可分为政论、序文和表笺三类。内容不同, 风格也有细微的差异: 政论言论慷慨, 说理警策; 序文叠意回舒, 互相映带; 表笺昭明心曲, 指事切要。虽说“体有万殊, 物无一量”, 但是从整体上说, 其散文风格, 既有汉代文章的醇厚温润, 又有魏晋文章的辞锋通脱; 说理精微朗畅, 风格壮采遒骨, 艺术个性十分鲜明。文如其人, 陆机“言论慷慨”“其声如钟”, 善于应对, 机锋逼人, 二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

〔关键词〕陆机; 无韵之文; 政论; 序文; 表笺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18. 11. 011

在陆机研究中, 诗歌关注最多, 散文则相对冷落。除文学史偶有涉及外, 专题论文唯以谭家健《陆机散文略论》(《中州学刊》1999 年第 5 期)、渠晓云《论陆机散文的“宏”风格》(《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为代表。前文总论陆机散文的内容特点和历史评价, 后文专论陆机散文宏大、宏远、宏深的风格。李晓风专著《陆机论》, 虽列有《陆机的散文》研究专题, 却论述粗浅。因此, 拓展深化陆机文的研究, 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徐公持先生说: “陆机之文, 诸体皆备。而才气充盈, 藻采瑰丽, 在西晋陵砾

---

作者简介: 刘运好(1955—), 文学博士, 现任亳州学院特聘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汉魏六朝文学; 黄东坚(1988—),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汉魏六朝文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文化视域下的陆机陆云研究”(15YJA751018) 系列成果。

诸雄。”<sup>[1]</sup>文虽存世不多,却体兼论、箴、颂、赞、笺、表、吊、诔、碑、铭,另有杂体《七征》《演连珠》各一篇。如果按照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进行划分,除诗赋以外,陆机文属于“笔”者有论、序、表、笺,属于“文”者有颂赞、诔吊、杂体。各体文章表现对象不同,内容有别,风格也微有不同。本文所论之“散文”即无韵之笔,包括政论、序文和表笺三类,至于“韵文”即有韵之笔,则另题论之。陆机的散文——无韵之笔,虽然内容不同、风格也有细微的差异:政论言论慷慨,说理警策;序文叠意回舒,互相映带;表笺昭明心曲,指事切要,但是,从整体上说,说理精微朗畅,风格壮采遒骨,则是其基本特点。

### 一、政论:言论慷慨,说理警策

陆机政论散文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今存《大田议》《晋书限断议》《辨亡论》《五等诸侯论》四篇。前两篇为短论,或为残简;后两篇乃宏文,是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品。“言论慷慨”(《晋书·陆机传》),说理警策,是其政论文的基本特点。

《辨亡论》,日本学者佐藤利行认为是在吴亡后退居旧里所作,<sup>[2]</sup>然文章称孙皓曰“归命”,晋曰“大邦”,晋师曰“王师”,当仕于西晋之后所作,故五臣注“大邦之众”曰:“大邦,谓晋也。作此论之时,吴亡,机仕于晋,故云大邦也。”<sup>[3]</sup>此文辨吴之兴亡,实是以吴为镜鉴而警晋;讨论治国之远规大略,为西晋统治提供方略。从当代到后世,皆将此文方之于贾谊《过秦论》。陆云《与兄平原书》曰:“《辨亡》则已是《过秦》对事,求当可得耳。”《文心雕龙·论说》亦云:“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也。”或以为可与《过秦论》媲美,或以为虽或不及却自有独立审美价值。然而,清蔡世远《古文雅正》卷二评贾谊《过秦论》(上)时,则极力推崇贾谊,贬低陆机,文曰:“势如崩崖,缩之勿坠;气如奔涛,蓄之复注。议论既正,出以绝大魄力,使读者酣快异常。陆士衡《辨亡论》酷意摹拟,笔力弱不及矣。”<sup>[4]</sup>谓摹拟《过秦》其言盖当,然谓之“酷意摹拟”云云,又皆有偏颇,可比较言之。

《过秦论》上篇论秦之兴盛、发展、鼎盛、衰亡的全部过程,其结论曰:“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辨亡论》上篇论吴之建立、发展、鼎盛、衰亡的全部过程,其结论曰:“成败贸理,古今异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二文结构相似,结论句式亦近。然而《辨亡》与《过秦》有四点不同:第一,论述重心不同。《过秦》重在论述秦走向鼎盛的过程,所以论孝公、惠王、武王、秦王几乎平均用力,篇幅大致近似。《辨亡》重在论述东吴走向鼎盛的原因,所以虽也简论孙坚忠勇霸世、横历江东,孙策征讨群雄、奠定帝业,但却以孙权为核心,渲染其内修国政,外御曹刘,论述中心较《过秦》明确,主题更为集中。第二,历史眼光不同。《过秦》认为取天下以权谋,治天下在仁义,凸显“攻守之势异也”;《辨亡》认为国家兴亡之本在于政治教化,简贤授才,凸显“授任之才异也”。前者强调“术”,着眼于君主政治;后者强调“人”,着眼于社

会结构。二文都具有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然而后者凸显社会结构的改良意义,其历史眼光似乎更具有普遍意义。第三,行文方式不同。二文的行文结构一般都注意前后句群的意义转接,运用“于是”“当是时”“延及”“且夫”等大量转语,这一点《过秦》与《辨亡》相同。然《过秦》虽重说理,却以气运文,对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揭示稍嫌不足;《辨亡》虽也重气,却理贯辞中,特别注意寻绎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反复运用“故”点明因果,构成严密的内在逻辑性。一偏于气势,带有战国策士的遗风;一偏于说理,带有汉文析理的印记。虽曰各有所擅,难分轩轻,然而从论说文角度看,陆机显得更为圆熟。是乃文体发展使然,断不可以“酷意摹拟”“不及”而贬低机文。第四,整体结构不同。《过秦》中篇剖析秦得天下及二世不能以“义”安民,以“仁”施政,故其衰也。下篇论陈涉兵起之后,子婴无救亡扶倾之才,又“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终致秦亡。后两篇亦从正面落笔,缺少变化,且中篇宏论秦王,稍显痴肥,故一般选集弃之不取。《辨亡》下篇从君主理政、贤臣辅政以及天地人三者之关系,论述国家兴亡,不惟在于天时、地利,更在于人和。论述主旨与前文不同。

在结构布局上,《辨亡论》上篇以叙为主,以论点睛;下篇以论为主,以叙为据。上篇重在正论,下篇重在辩驳,相辅相成,既构成一个完整整体,又见整体结构变化之妙。在表达方式上,“述孙权之兴,包含着无限缅怀;记孙皓之亡,流露出深沉哀叹”。<sup>[5]</sup>写东吴之帝业鼎盛,铺张扬厉,意气飞扬;写邦家倾覆,则用笔了了,神情萧然。饱蘸深情,却情余言外。干宝《晋纪总论》、苏洵《六国论》等,皆受此文之余泽。

“五等诸侯”是西周宗法制的历史产物。至秦始废除封侯,实行郡县;汉代始则封侯,旋即废之。魏承汉制,然至魏咸熙元年(264),司马炎为禅魏而争取世家大族支持,始建五等爵,并于晋太始二年(266)正式诏封五等,从而采取了与魏不同的政治体制,也形成此后藩王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成为八王之乱的直接源头。因此,从内容看,《五等诸侯论》应作于入仕西晋之初,八王之乱发生之前。

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五等诸侯论》所表现的思想,或许已经保守僵化,即使文章中闪烁着许多思想的亮点,也不足以弥补整体上的思想缺陷。然而,从文章学抑或从论证艺术的角度看,又是一篇奇文。此文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稽之史实,反复比较。文章着重以自周至汉政治体制的发展沿革与变化之历史,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反复论述五等封侯之是,郡县政体之非,整体上构成纵向比较。特别是论述秦汉之时每一部分都运用对比,如论周代遭季世之乱,结局是“片言勤王,诸侯必应”“强晋收其请坠之图,暴楚顿其观鼎之志”;秦遭季世之乱,结局是“一朝振矜,远国先叛”“刘项之能窥关,胜广之敢号泽”。同样,“在周之衰,难兴王室……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而“二汉阶阨暂扰,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乱”。三代同是遭逢季世,却结局迥异,功业相反。因为以史为据,通过比较,其结论亦令人信然。第二,论驳结合,正反同因。犹如

《过秦论》《五等诸侯论》亦是有正论有驳论。主体是正论,结尾是驳论。所驳者乃是谓“五等所以多乱”“郡县易以为治”的假想论敌,然后从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的角度,论述五等易治、郡县易乱之理。最后上升到人情、事理、体制的理论抽象,反复推论其五等诸侯之是,牧守郡县之非。作者在论述中始终紧扣两种政治体制所造成的不同结果作正反对比,而用来对比的两种不同结果,又系于同一原因:“盛衰隆弊,理所固然,教之废兴,系乎其人”,人之教化,是国家盛衰隆弊的决定因素;出于同一人性:“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人之私欲,是决定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二者构成内在的因果联系。“五等之君”易治,是诸侯“为己思治”;“郡县之长”易乱,因牧守“为利图物”。这种思想已经悖离了传统儒学,而深入到人性的深层,也是陆机识见高人之处。这种正反同因的论述,使其达到了一种极高的论辩艺术境界。第三,以论为体,思辨谨严。文章虽重史实,主体却在论——以论为体,以史为据;与《辨亡论》虽重说理,主体却在史——以史为体,论从史出,有显著的不同。文章首先论述五等之制的历史渊源、产生原因、历史作用,然后论述这一政治体制在秦汉两代的衰微及其严重后果,说明五等易治、郡县易乱之理。结构与思想似乎平淡无奇,何以警动人心?其中抽象思辨的深刻是其重要原因。作者特别善于从历史规律和普遍人性的角度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如“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已在乎利人”——治政之准则;“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人性之特点;“愿法期于必凉,明道有时而闇。故世及之制弊于强御,厚下之典漏于末折”——历史发展观,等等,片言居要、惊心动魄。而且作者的论述并非固守论题本位,而是客观分析问题利弊,如“是以经始权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致治之具”,上文所举,对五等封建所形成的末大本折的弊端分析,都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对历史的辩证认识也都十分深刻,从而使全文说理言之凿凿,逻辑无懈可击。此文对唐影响甚远,柳宗元《封建论》、朱敬则《五等论》、李翰《汉祖吕后五等论》,均与此文有丝缕联系。

说理警策,议论慷慨,是陆机政论文的基本特点。其说理,以时间为线索,以正论为主体,以辩驳为补充,以对比映照耸动人心,得汉代论文醇厚之沾溉;其句式,以文情为转关,以短句为主体,以对偶和谐声韵,以铺陈排比形成气势,有汉代辞赋扬厉之余风。一气灌注,又盘旋而下;气盛言宜,又顿挫有致,从而下开韩、柳正论之先河。然而,同为正论,《辨亡论》理中有情,情余言外,《五等诸侯论》从容说理,理胜于辞。二者也微有差异。

## 二、序文:叠意回舒,互相映带

从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对文体的分类看,“序”在魏晋时期并未形成独立的文体,而是附着于诗、赋、文之前。大约也是属于“为篇立体,临时设类”<sup>[6]</sup>的类型。经《文选》专设“序”类之后,才逐渐发展为

独立的文体,至唐代而蔚为大观。

今存陆机序文 16 篇,其中赋序 11、诗序 3、文序 1、颂序 1。虽附着于其他文体之前,或交代背景,或说明缘由,或评价他人作品。议论、叙事、抒情,圆融统一。或为正文意义提供解读线索,或为正文生成提供背景材料;在内容上,序与正文或各有偏至,可独立成文;或互相补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最有特色的是《豪士赋序》和《吊魏武帝文序》。前文《文选》舍赋选序,后文《文选》文序并收——然李善认为“序胜于文”。足见这两篇序文在萧统和李善心目中的分量。“叠意回舒”(《晋书·陆机传》),互相映带,是两篇序文的基本特点。然而着眼点不同,手法也有区别。

《豪士赋序》乃讽刺齐王司马冏所作。永宁元年(301),赵王伦篡位自立,冏起兵诛伦,迎惠帝复位,其功盖弘。然而,冏又专擅朝政,引起诸王不满。太安元年(302),诸王起兵讨伐冏,常山王乂乘机杀之。此文即作于冏被杀之后。“机恶齐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让,及齐亡,作《豪士赋》。……犹假美号以名赋也。”<sup>[7]</sup>所谓豪士,乃指智勇超人者。机用反语,以寓讥讽。

序文正面阐明古人因时而成功业,然累于私欲,觊觎天下,不知去势求安,辞宠招福,居位守节,功成身退,终于招致祸患。意分四个层面:第一,由社会、历史抽象概括普遍道理:立德取乎自我修养,建功则因乎外在条件。平庸斗筲小人也成就事业,盖时势使然。意谓司马冏才能平庸,器量狭小,所以成功者,因其时势也。第二,历史上,周公、宁氏、魏相、霍光才非常人,节守忠诚,尚为人主所不堪,更何况庸人!以此论述隐蔽于人主与权臣之间的“用”与“疑”的复杂关系。然后再进一步论述权臣若累于私欲,不度才量力而觊觎天下,必然招致祸患。意谓司马冏应恪守为臣之大节,毋生篡逆之心。第三,周公、霍光扶国家于倾覆,佐人主而登基,尚难取信于人主,止谤于众口;伊尹、文种德厚至忠,尚遭主戮,况才短而贪大名者乎!意谓司马冏宜去势以求安,辞宠以招福,切忌以威势而伤民心、震人主,否则必然遭致颠仆祸酷。第四,由社会、历史的普遍道理而转入论述现实人生:情之所恶,心之所欲,贤愚共有,故游子求官,志士求名。然而必须居位恪守臣节,功成而身退,若昧于功业、权势、欲望,则名编凶顽之条,身厌荼毒之痛。赋言司马冏遭逢国家颠沛、群奸交会之际,因时而动,位极人臣,然不知远志浮云,反而操弄国柄,潜生不臣之心,终至重蹈覆辙,祸至自陨。其序设论,并以史证之;其赋抒情,融入叙论,充满感叹,实是序论之实证。序与赋,互相映带,故说理透辟,惊心动魄。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曰:“陆士衡《豪士赋序》当时之体,然恣切动听。‘广树恩不足以敌怨’二句,惊心动魄之言。”所谓“当时之体”,即是指骈文体;“恣切动听”,乃语言平实恳切,韵律和谐。汉晋之际,骈文初兴,不像后来骈文,讲究严格的对偶声律,甚至骈四俪六,而是以骈为主,间以散句,唯求音声迭代,韵律自然变化而已。唯以如此,虽然有学者认为陆机乃骈文之集大成者,但这篇骈文仍然在整饬句式不失活泼灵动,在近乎散体的平实表达中,语中肯

繁, 警动人心。如文章开头阐释立德之基有常, 存乎自身; 建功之路不一, 系乎际会, 尔后藉比喻和史实分别论之: “落叶俟微风飏以陨, 而风之力盖寡; 孟尝遭雍门以泣, 而琴之感以末。何者? 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 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是故苟时启于天, 理尽于民。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 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 言遇时也。”从句式上说, 上下对与隔句对相间, 散句与整句相间, 长句与短句相间, 虽整饬而不板滞, 读来畅达而不隔, 所以“动听”; 从句意上说, 微风落叶, 非风力之大, 乃时势使然; 孟尝下泪, 非琴音感人, 乃心存哀戚——分别说明建功系乎际会、立德存乎自身之理。通过自然与人事对照, 水到渠成地引出庸夫可成圣贤之业、小人可定壮士之功的结论。说理透彻, 取譬平实, 用典贴切, 读来浅近而精警, 所以“恻切”。

元康八年(298), 陆机出补著作郎, 于秘阁中得见魏武曹操《遗令》, 感慨系之, 作《吊魏武帝文》, 叙述其见魏武遗令时的复杂伤感的情怀。此序假托问答, 先抑后扬。先借客人之口, 说明生死终始, 乃自然规律, 曹之遗令乃百年前事, 事或可哀, 悲则不必。然后正面阐述其产生哀情忧伤之原因: 魏武雄才大略, 光被四表, 面对死亡时却系情外物, 留恋闺房, 充满无奈和眷眷之心。“智慧不能去其恶, 威力不能全其爱”, 实是人生之大悲, 故愤懑吊之。

正面论述部分又分为四层展开: 第一, 以日蚀山崩为喻, 说明日月之明, 不免蚀蚀之累; 安逸之山, 或遭顷刻之患。自然尚且如此, 何况人乎? 第二, 由自然转入人事, 说明即使经天纬地的英雄, 面对死亡亦无可奈何。“雄心摧于弱情, 壮图终于衰志”, 从自然规律上说, 疾病与死亡是上帝赐给人类公平的礼物; 从生命主体上说, 疾病与死亡摧折了人生的一切雄心壮志, 又是何其残酷而无奈! 第三, 由普遍的人事之理, 转入对曹操遗令叙述, 说明“曩以天下自任, 今以爱子托人。同乎尽者无余, 而得乎亡者无存”, 当初横历天下, 何其英武自信; 而今爱子托人, 何其哀伤而无奈。在今昔对比中, 渲染曹操生命之光即将熄灭时的悲剧, 又何其耸人心魄。第四, 又由曹操之遗令生发开来, 慨叹“智慧不能去其恶, 威力不能全其爱”, 睿智的雄杰亦如凡夫, 面对生命的消逝也无可奈何。这是英雄的悲剧, 也是人类的悲情人生。正如序文所论, 正文按照功业—染疾—遗令—慨叹的结构顺序, 展开叙述、抒情和议论, 二者亦互相映带。

《文心雕龙·哀吊》评之曰: “陆机之吊魏武, 序巧而文繁。”序以论为主, 夹议夹叙。所谓“巧”,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议论饱带感慨。“夫以回天倒日之力, 而不能振形骸之内; 济世夷难之智, 而受困魏阙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 藏于区区之木; 光于四表者, 翳乎蕞尔之土。雄心摧于弱情, 壮图终于衰志。长算屈于短日, 远迹顿于促路。”包举宇宙、叱咤风云的英雄, 一旦面对死亡, 摧折的壮图雄心立刻化为凡夫的弱情衰志, 一切弘图远规伴随生命的消逝而化为乌有。作者将英雄末路的悲剧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己无限感慨亦蕴含其中。陆机欲闻华亭之鹤而不可得的人生悲剧, 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二, 叙述浸染情感。“观其所以顾命冢嗣, 贻谋四子, 经国之略既远, 隆家之训亦弘。又云: ‘吾

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善乎达人之说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在贻谋四子的叙述后,夹入“善乎达人之说言矣”抒情;在托幼女、小儿子于四子之叙述后,又插进“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的酸楚感慨,使叙述之中笔端充满作者的无限情怀。第三,结构翻转推进。序在结构上由自然现象转入社会人生,再由社会人生转入曹操悲剧之叙述,最后由曹操悲剧上升到普遍人性。按照自然现象——抽象说理;人事之理——以事证之;最后以人性存在的劣根性收束全文,以此布局小序,结构宏阔而不局狭,层次清晰且又曲折。

从抽象的道理说起,以具体的史实证之;或从普遍的现象说起,以抽象的道理作结,是陆机论序类文章的基本特色。如果说陆机政论以理胜,那么序文则以意胜。理与意内涵互摄,难以截然分开。然而,理重理性,因现象而入理;意趋感性,因情感而入理。“叠意回舒”,是陆机序文的基本特点。所谓“叠意”,即意义繁复;“回舒”,即回环展开。或围绕序文主旨,或围绕全文(序与正文)题旨,反复论说,互相映带,使题无剩意,文不遗情。前者如《豪士赋序》,后者如《吊魏武帝文》。这种“叠意回舒”,既使文意表达刻露无余,淋漓尽致,又使文情剥茧抽丝,回环跌宕。

### 三、表笺:昭明心曲,指事切要

表笺是古代公文的一种体裁。王筠《说文句读》曰:“汉末人上书曰笺,亦曰表也。”表亦曰章,故刘勰章表连称。《文心雕龙·章表》曰:“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其《书记》又曰:“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由此可见,表笺之类原是大臣的上书。从文体学上说,属于上行公文。因为是称颂君王之美,对答君王之问,故其共同特点是昭明心曲,指事切要。然而,谢恩之章,应显名教风范;陈请之表,必彰骨力词采。

除去残句断篇,陆机存笺表五篇:《谢平原内史表》《至洛与成都王笺》《与赵王伦笺荐戴渊》《荐贺循郭讷表》《荐张畅表》。前两篇为受命谢恩之作,后三篇为举荐陈请之章。

《谢平原内史表》是一篇特殊的谢恩明志之作。《文选》李善注:“臧荣绪《晋书》曰:成都王表理机,起为平原内史,到官上表。”<sup>[8]</sup>《西晋文纪》则详细说明之:“赵王伦辅政,引机为相国参军。伦将篡,以为中书郎。及伦诛,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收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救免。冏败,颖表为平原内史。”<sup>[9]</sup>

此文开头叙述上表之原因,正文分为三层:第一,叙述身受皇恩之隆,横遭诬枉之痛,重在辨白。第二,表达对成都王怜悯臣之落魄,核察臣罪,使臣生还,且昭雪沉冤,谤绝众口,大过自己之所望的感激之情。第三,既表达蒙垢临命、身负重任之喜悦,又昭明守职报恩、临别依依之心志。

本表在艺术结构上欲扬先抑:横遭齐王罔诬枉,使臣沉冤难雪,身逢绝境——绝望;陛下恩泽布施,使臣尘洗天波,绝处逢生——希望;蒙垢临命,身负重任,重沐天光——新生,这就将对成都王援手相救、恩同再生的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刻露无余。在表达方式上,曲折与直陈交错。作者辨白自己横遭诬枉时,有间接辨白,如文章开头,“皇泽广被,惠济无远。擢自群萃,累蒙荣进。入朝九载,历官有六,身登三阁,官成两宫。服冕乘轩,仰齿贵游。振景拔迹,顾邈同列。施重山岳,义足灰没。”言自己深受晋恩,没齿以报,申述其断无背晋叛逆之由,是间接辨白。而接下来,“臣之微诚,不负天地。……片言只字,不关其间,事踪笔迹,皆可推校。”希望考究事实,昭雪其冤,则是直接辨白。前者是铺垫,后者是直陈,文情层层推进,在切要的叙事中,使辨白显得无可辩驳。另一方面,叙述、抒情融合,也是本文表达方式的一个特色。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叙述,然身受晋恩之感激,横遭诬枉之痛苦,微诚不达天听之绝望,浸润于文章的叙述之中。第二部分则是或抒情,或叙述,或叙述与抒情融合。“复得扶老携幼,生出狱户,怀金拖紫,退就散辈”,是叙述;“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踏地,若无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云雨之泽,播及朽瘁”,是抒情;“重蒙陛下恺悌之宥,回霜收电,使不陨越。……忘臣弱才,身无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书,得夷平民,则尘洗天波,谤绝众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则又是抒情与叙述有机融合。在语言艺术上,有白描,有譬喻。一般说来,叙事须条畅切要,故多用白描;抒情既要昭明心曲,又忌浅露直白,故多用譬喻。前者勿须多言,后者如“猥辱大命,显授符虎,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陆沉之羽,复与翔鸿抚翼”,生命再生的感激之情,以譬喻表达,既昭明又含蓄,故刘勰谓之“情周而巧”。《文心雕龙·书记》曰:“陆机自理,情周而巧,笺之善者也。”所谓“自理”实指此表,而非《至洛与成都王笺》,或文题倒错。

此外,陆机率兵,将临洛阳,上书成都王《至洛与成都王笺》。从行文格式看,此是残简,然就其文体功能而言,是一篇书信体公文。书信非如章表,“章以谢恩”“表以陈请”(《文心雕龙·章表》),书信则直陈心迹,故此笺先言朝政之混乱,再言成都王之举正义之师,后言临阵受命之重任。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指事切要。然艺术上不及上表,是典型的公文体式。

陆机的三篇陈请举荐之表,以《与赵王伦笺荐戴渊》《荐贺循郭讷表》为佳构,《荐张畅表》或为残简,文采、说理远逊于上述二表,故略而不论。

先说《与赵王伦笺荐戴渊》。永康元年(300),赵王伦摄政,机任相国参军,作笺于伦,陈请举荐戴渊。戴渊字若思,广陵人。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与其徒掠机。机察渊举止,知非常人,遥谓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复作劫邪!”(《晋书·戴若思传》)若思感悟,流涕投剑就之。机与之言,深加赏异,遂与定交。若思后举孝廉,入洛,机荐之于赵王伦,伦乃辟之。

此笺的开篇分别从君主治世与人才用世两个角度抽象说理:“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迹之



器；蕴匱之才，思托大音之和。”意即才为世用，方建大功；士隐丘园，明主求之，故旷世之主，藉远才而用之；蕴玉之才，托盛世而效力。这段文字，既是说理，亦为下文铺垫。言外之意，所荐者乃蕴玉之才，所用者为旷世之君。若不用之，还可称“高世之主”吗？荐辞之巧，意余文外；达意之妙，不着痕迹。故下文从襟怀、道德、才识、节操四个方面，说明戴渊“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其才可用，故陈请举荐；“若得托迹康衢，必能结轨骥驥；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琦璠矣”，如能用之，必如骏马驰于大道，玉光垂照朝廷，从假设的结果进一步申述举荐的理由。至此，举荐之理已经十分显豁，然作者又翻出“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列于贡玉”，既喻戴渊才如珠玉，强调举荐之由；又喻若为所采，则使光照当世。综观全文，有抽象说理，言举荐之大方；有具体陈说，言举荐之缘由；还有悬想推论，言举荐之结果；最后以比喻翻进一层，申述举荐之意义。一篇短笺，既是层层推进，又是层层铺垫；反复申说，意义曲折而又显豁。

再说《荐贺循郭讷表》。贺循字彥先，会稽山阴人。曾祖齐、祖景皆仕于吴，父邵官中书令，为孙皓所杀，徙家边郡。吴平，循乃还本郡。刺史嵇喜举秀才，除阳羨令，后为武康令。郭讷字敬言，吴人，入晋官蒸阳令。循守下年，讷亦栖迟，皆无援于朝，久不进序，故陆机上表举荐二人。后来，循迁太子舍人，讷除太子洗马。

一表同荐二人，本难缕述，然作者首先分论二人才德、政能，“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以及才不获骋、年华浪掷的遭遇，“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虽曰有异，抑又同也。故下文用“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合而论之，点明二人栖迟的共同原因。然后说明举荐之理由，按朝廷惯例，“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即选举台郎，宜令各州均平。今二人分属荆扬，且地广人稠，却无朝官，不合朝廷选官之通例。再分述二人所宜之职位，“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最后言举荐循、讷乃众望所归，既非“企及清途”，乃一己私愿；亦非“苟充方选”，而滥竽充数。全文以贺循、郭讷官当台郎为举荐核心，重在说明理由——以二人才德论，当举；以选官制度论，当举；以人心向背论，亦当举。荐表说理充分，言之凿凿。而结构有分有合，虽短小而见结构之匠心。

在行文与表达方式上，此表与上笺大不相同。此表融情入理，充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故骨力遒劲；上笺融理入情，以情动人，故词采飞扬。同是公文，或以情胜，或以理盛。此表当为汉魏之本色，上笺或为时代之变体。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可知，表笺之文，原本指事切要，道理周详，言辞简约，后来或气扬采飞，或志尽文畅，至晋又引义比事，必用对偶。纵观陆机此类文体，则虽重本色，却袭故弥新。

#### 四、风格: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文赋》曰:“体有万殊,物无一量。”陆机的无韵之笔,文体不同,表达有别,大致说来,政论以理胜,序文以意胜,表笺以情胜。但是,就内容而言,最为警策的部分在于说理;就形式而言,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风骨。精微朗畅,壮采遒骨,则是其风格的基本审美特点。

精微,是“才欲窥深”(《文心雕龙·才略》)的思想结晶。“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赋》)。以高度抽象的语言说理,深刻而警策,是其散文的特点之一。如《豪士赋序》:“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则?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存夫我者,隆杀止乎其域;系乎物者,丰约唯所遭遇。”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将立德存乎自身,具有主观必然性;立功因乎际会,具有客观偶然性。这就将二者的区别,阐释得深刻透辟。然后,从自然现象到历史事件,说明风云际会的外在条件推动了个体生命能量的扩张,所以庸夫小人也可以建立功业。然而,际会风云而成功者,能量有限却欲望无穷,因此又造成君臣关系的紧张。“夫以笃圣穆亲,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过此以往,恶睹其可!安危之理,断可识矣。”这就将君臣遇合之难,臣下处世危艰,写得触目惊心!对于斗筲平庸而觊觎王权的得势者,不啻是一贴灌顶醍醐。在《吊魏武帝文》中,“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衰志”的死亡之悲,“同乎尽者无余,而得乎亡者无存”的无奈情怀,“智慧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的人性缺陷,也都表现得斩绝刻露,发人警醒!《大暮赋》序虽然简短,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耶,又何生之足恋?”乐生哀死,本是人之常情。然而,作者由人死之后是“有知”抑或“无知”两种假设性的悖论,又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死不足悲,生不足恋,从而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日常认知,深刻演绎了道家生死一如的生命哲学。

朗畅,是“思能入巧”(《文心雕龙·才略》)的艺术表现。“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文赋》)。说理起承转合,收纵自如,读之如贯连珠,一往必达,是陆机散文的特点之二。精微必待朗畅,否则即为晦涩。陆机散文善用“发头”起始,“转句”转接,“结句”收束,而且又多用同义词,加重语气,使语意繁复而文气贯注。如《五等诸侯论》第二自然段,<sup>[10]</sup>论封建五等诸侯之产生原因、重要作用。就结构上说,文章大量运用助词、副词、连词,作为贯注文脉的结构手段,如“夫……故……于是乎……又有以……故……是以……故……夫然则……故……然后……盖……”等。先用发语词“夫”引起,然后用“故”“是以”表前后因果,“于是乎”“然后”表顺承连接,“又有以”表并列连接,“夫然则”表转折连接,最后用“盖”表推断,得出结论,收束段意。既有细针密线的结构,又有一往必达的文气。就句式上说,“夫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旷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五长,所

以弘其制也”，句式内部或用跳跃式顶针，如“至重……重……任重”“至旷……旷……制旷”；或在前后句中用因果连词，如“故……所以……所以”。在意义层次上，这一节内容是第一段“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叶”的所论之果；在复句关系上，这一节内容又是后句“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的所论之因。如此蝉联而下，使文章意脉连贯，又气势流转。加之以对偶与整句为主，间用散句，使整飭中显现其疏朗；其句尾，或不用语气助词，使阅读时前后语气贯注而畅达；或偶用“也”或“矣”煞尾，变化中增加了文章感喟的情感和摇曳的风情，别具朗畅之美。

壮采，是“结言端直”（《文心雕龙·风骨》）的语词艺术。“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文赋》）。遣词造句，质直挺拔，发端有力，结响清彻，是陆机散文的特点之三。如《辨亡论》（上）开头：“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紊，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失御”和“窃命”对比，写朝廷乱象之深；“京畿”和“宇内”对比，写祸毒范围之广。然后，以“皇纲弛紊，王室遂卑”收束，总括王纲解纽、政治无序的社会状态；再以“于是”承接，描写天下分崩、群雄逐鹿的风云时势。前六句，每两句是对偶的一组，既是对比，又构成内在的因果关联。并且前两组对偶句与后一组对偶句，构成内在的因果关联；前六句的三组对偶句与“于是”后的一组对偶句，也构成内在的因果关联。且用“祸基”“毒遍”，在揭示动乱根源、波及范围的同时，又将动乱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描摹得骇骨惊心；用“蜂骇”“四合”，在揭示天下分崩、群雄逐鹿的同时，也将混乱时势对社会心理的震动描摹得淋漓尽致。文章发端质直，用语挺拔，不作迂回，直插主题，句式对偶，因果毗连。不仅写出时势混乱，而且写出混乱时势对社会心理的耸动。陆机散文的结语，也往往是结响清彻，如《五等诸侯论》：“然则探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辨亡论》（下）：“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纵贯历史，尺幅千年。或陈述历史事实，抽象本质，用语明快；或引述历史悲剧，反题正说，用语委婉。然而，都用确认语气“矣”收束，语义斩截而不拖宕，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都呈现出结响清彻的壮采之风。

遒骨，是“风骨之力”（《文心雕龙·风骨》）的审美表征。《文心雕龙·风骨》曰：“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说理警策，结言端直，加之运用大量的对偶俳句，抑扬顿挫，形成江河直下的文章气势，是陆机散文的审美风格。仅就文章气势而言，在魏晋时期，陆机的对偶俳句运用得最为娴熟，比曹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散文或由散句引起，以整句承接之；或由整句发端，以散句承接之。如《与赵王伦笺荐戴渊》，开头全用对偶俳句说理：“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迹之器；蕴匱之才，思托大音之和。”对偶俳句，或隔句对，如首四句；或上下句对，如后两句。然后又用散句介绍人物，

“伏见处士广陵戴渊,年三十,字若思,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散句之后,又以整句承接之。如此,则使文章气势充沛,又婉转有致。此外,或在偶俳句之中,将说理与比喻交错,如“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圣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必能结轨骥驎;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玕璠。夫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列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使文气江河直下,又含蓄蕴藉。这种艺术处理,使整篇文章说理方式有变化,但由句式整饬所形成的充沛文气,仍然一以贯之。当然,陆机政论,如《辨亡论》《五等诸侯论》以及残篇《晋书限断议》《大田议》,重在说理,唯以气势取胜,其遒骨的风格更为彰显。渠晓云《论陆机散文的“宏”风格》,实际上是陆机散文风格遒壮的一个方面。

以上分析,虽止于尝鼎一脔,但亦可见,从整体上说,其散文内容与艺术风格,既有汉代文章的醇厚温润,又有魏晋文章的辞锋通脱;说理精微朗畅,风格壮采遒骨,艺术个性十分鲜明。文如其人,陆机“言论慷慨”“其声如钟”,善于应对,机锋逼人,二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

### 注释:

- [1]徐公持:《陆机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 [2][日]佐藤利行:《西晋文学研究》,周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 [3]萧统:《文选》,六臣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76页。
- [4]蔡世远:《古文雅正》,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80册,第24页。
- [5]谭家健:《陆机散文略论》,《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
- [6]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 [7]萧统:《文选》卷四十六,六臣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42页。
- [8]萧统:《文选》卷三十七,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24页。
- [9]梅鼎祚:《西晋文纪》卷十五,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02册,第2页。
- [10]参阅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1977年,第1037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